

威廉到一家公司面試，面試官馬克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人。威廉向馬克做了自我介紹，表現出對應聘職位的極大渴望，但他提出的薪酬也不低。為了確定這個人“貨真價實”，馬克開始發問了。

“威廉，我已經基本瞭解你的情況。我想知道你平時有什麼愛好？”馬克貌似隨意地問了一句。

“我很喜歡旅遊，一有時間就出去玩。”威廉輕鬆地說，“在過去幾年里，我去過巴西、澳大利亞和許多歐洲國家。對了，我還去過印度呢，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哇，你去過的地方可真多！”馬克一臉贊賞，“不過澳航的飛機總是晚點，我上次去悉尼就等了很長時間。”

“我去澳大利亞的時候倒沒遇到過這種情況，但歐洲航空公司確實存在這個問題。有一回我在希斯羅機場足足等了十個小時，還有一回在巴黎也碰到了飛機晚點。”威廉一臉憤憤不平的樣子，他一邊回憶着那次經歷，一邊說。

“是啊，那可真糟糕，你沒有投訴嗎？”馬克順着威廉的話問道。

“事實上我沒有投訴，我覺得那樣做毫無意義。



兜個圈子

義，因為航空公司總是準備了充足的理由等着你。在這種情況下，我一般會喝杯咖啡，看看書或者寫點兒東西，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投訴有用嗎？反正我沒試過。”威廉看着馬克，那眼神好像在問：“你試過嗎？”

“確實沒什麼用。”馬克苦笑了一下，“好的，我沒有什麼問題了，你等我的消息，好嗎？”

“好的，謝謝你。”威廉起身和馬克握了握手，結束了自己的面試。三天後，威廉接到了錄用電話。

在面試過程中，無論是工作經歷或對職業的渴望度，威廉都表現得不錯，但馬克還需要瞭解他的態度。馬克採用了側面問話的技巧，在關於飛機晚點的談話中，他是想知道對方在職場遇到不公平待遇時會怎么做。

我有一位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朋友叫薩默爾，他說：“我們遇到過各種各樣的人，有時候無法直接撬開他們的嘴，但‘兜個圈子’往往能找到答案。”

作為控場者，你需要深諳對方的心理，這樣才能更好地掌控對方。有時候直接問話容易使對方尷尬，你往往也得不到最真實的回答。“兜個圈子”能幫你打開談話的突破口，這真的很管用。

傳統從哪里來

在畢業典禮上穿學位服，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紀，當時歐洲多數學者是神職人員或者希望成為神職人員。求學者在學校的穿着和神職人員的日常着裝非常相似，只是顏色不同。

此外，這樣的袍子很實用。在大學還沒有校園時，授課都在附近的教堂進行。學生們穿着長袍可以幫助他們在空曠的教堂中保暖，學位袍後面的兜帽則能為他們遮風擋雨。

13世紀，牛津大學率先對學位服做出標準化的規定，所有教職人員都在袍子外面套上斗篷。當時神職人員的着裝已經改變了風格，這樣的着裝逐漸成為學者的專利。1321年，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學規定了本科生和博士生的標準服裝。到了都鐸王朝時期，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採用了同樣的着裝標準。19世紀，各個國家紛紛對學位服進行改良，並且用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學科。如今，在校期間學生不必一直穿着學位服，但在畢業典禮這樣的“大日子”仍然要回歸傳統，來增強儀式感。

學位帽在14世紀初，是牧師的標準帽，到了15世紀，學位帽成為大學中學術大師和博士的標準着裝，目的是讓他們區別於學校中的普通學生。這個時期的學位帽因為稀少而尊貴，通常帶有精緻的

刺繡和裝飾。法國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就這樣描述過他從博士生變為博士，正式在大學授課的過程：“我坐在充滿象徵意義的教授椅上，獲得了一本打開的書、一枚金戒指和一頂學位帽。”

隨着時間流逝，戴上學位帽的門檻在逐漸降低。現在，大學里各個階段的畢業生都有權戴上這樣的帽子。

扔帽子的傳統始於學位帽普及之後。1912年，美國安納波利海軍學院的畢業生首次將帽子扔上天。當時學校決定讓畢業生戴着軍官帽參加畢業典禮，因此學生們將學位帽扔上天，騰出腦袋戴軍官帽。



有一次我去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一個活動，找不到地方，在校園里攔下兩個女孩子問路。“同學，請問這幢樓在哪里？”我拿着寫了地址的紙片問她們。

兩人看了地址也搖頭不知，但她們馬上有主意：“你可以用GPS查一下呀。”

“可是我沒有GPS。”

“手機上的地圖就行。”

“可是我的手機不能上網。”

“沒關係，我們校園里有免費Wi-Fi。”

“可是我的手機即使有Wi-Fi也不能上網，它根本就不能上網。”

她們倆對視了一下，睜圓了眼，揚起眉毛，嘴角呈現詭異的淺笑，聳聳肩走了。這讓我有點內疚：這年頭還在用不能上網的手機或許不是我的錯，可拿着它出來嚇人就真的是我的不對了。這兩個一看就是“90後”的小女生，這輩子怕是都沒見過不能上網的手機，她們肯定以為我是個從古代穿越而來的怪物呢！

我曾發誓做世界上最後一個使用非智能手機的人；而它也盡職盡責地承載着我對這個急速智能化世界的全部猜忌和抵觸，幫我與它疏離、向它宣戰，幫我在e時代的滾滾洪流中“倒行逆施”、螳臂擋車。但這台老實巴交的磚頭機哪知道，我雖然抵得住Siri和小冰這樣的機器，卻很難承受被周圍的人當作異類而拋棄的孤獨；它哪知道在這場戰爭里，我們的敵人並不是那些被頭腦和思想武裝起來的兄弟，而是我那些心甘情願繳槍投降、俯首稱臣的親朋。

我什麼時候恨上那些喜歡在人類面前抖機靈的機器了？這事兒因為年代久遠已經說不清楚。反正2007年喬布斯在台上意氣風發地顯擺第一代iPhone的時候，我完全像只看到一個被咬了一口的蘋果那樣心如止水；反正當我嫁給了一個對那些以“豆奶——豆奶加

冰——豆奶加冰再加糖——豆奶加冰加糖再加煉乳”模式依次推出的所有蘋果新品都狂熱到樣樣必得的腦殘“果粉”後，我就已經堅信它是個“邪教”；反正當人們的身家性命越來越多地懸于一串串用戶名和密碼之上時，我就已經覺得山雨欲來；反正當人們開始激動地推演大數據里隱藏的秘密時，我就已經覺得草木皆兵。

總之這樣的世界早就開始讓我恐慌，相對來說現在阿爾法狗在圍棋桌上銳不可當的態

在人工智能年代裏奔跑

勢倒不算什麼了。害怕阿爾法狗的人無非是忌憚它表現出的超人智力，擔心人類被機器統治的未來而已，但人們不是早就在聽到手機叮咚召喚便立即放下所有的事去刷朋友圈了嗎？GPS把人帶到溝里的消息不早就不是新聞了嗎？機器統治人這件事不是早就已經發生了嗎？

我倒是能說清自己為什麼會恨上那些喜歡在人類面前抖機靈的機器。

英劇《黑鏡》一集一集拆穿人類在歡天

把有限的錢花在最出彩的地方



2013年12月，西捷航空公司挑選了兩個從多倫多到卡爾加里的航班，在候機區安裝了一個類似於聖誕禮物盒的小亭子，里面有一個電子屏幕，屏幕上閃爍着“請掃描登機牌”的字樣。按要求掃描後，乘客發現屏幕上出現了聖誕老人。聖誕老人熱情地和乘客互動，他笑呵呵地問乘客是誰，想要什麼聖誕禮物。這一切似乎都沒有惡意，大多數人也只是像做遊戲一樣說出了自己的期待。有的乘客說想要一台攝像機，有的乘客說想要襪子和內衣，還有的乘客

說想要果汁機或溫暖的圍巾等。

這些乘客登機後，估計90%的人都忘記了自己與聖誕老人的邂逅。在這250位乘客飛往卡爾加里的5個小時中，卡爾加里175名西捷航空員工奔走于百思買等大型超市，從貨架上迅速取下每位乘客想要的聖誕禮物，從襪子到電視機等，員工們包裝好禮物，快馬加鞭地送至卡爾加里機場的行李領取處。當乘客到達卡爾加里機場，在第8號行李運輸帶周圍準備取行李時，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現了：行李帶上出現了大大小小包裝好的禮物，上面寫着乘客的名字。

我敢打賭，你在YouTube上看到這段視頻時(WestJet Christmas Miracle: real-time giving)，肯定會情緒激動。去看看，在你之前已經有幾千萬人看過了。

西捷航空公司的這次營銷活動真的太不可思議了。如果依靠傳統的營銷手段，不知道要花幾百萬美元才能換來这么多的關注，肯定比買禮物的錢多得多。

多走一步

有一次，我去師大夜市吃東西，晚餐的時候和同桌的一個男生聊了起來，他告訴我，他是另一所大學的畢業生。

“你不是師大的學生，怎麼會跑到這里來呢？”

“我來這里游泳。”男生說。

“你已經畢業了，以後打算做什麼呢？”我找話題隨便聊聊。

“我要去蘇格蘭念數學博士。”他的臉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怎麼會想到去蘇格蘭念博士？”我好奇地問。

“我拿到了全額獎學金。”男生回答。

“哇，真厲害！”

“我其實連哈佛和耶魯都申請到了，但是因為只有蘇格蘭的學校給了我全額獎學金，所以我選擇去蘇格蘭。”

“你是做什麼研究的？”

“數學運算。”

“可你能拿到獎學金，肯定很厲害啊！”

“全世界懂數學運算的人太多了，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發獎學金給我嗎？”男生笑了笑，告訴我一個訣竅：“因為我事先做了功課。申請學校的時候，我查了資料，得知下一屆奧運會在倫敦舉辦，還查到奧運村就在我想申請的那所學校，所以我做了一個提案，內容是幫助他們的國家游泳代表隊做數學運算，推測在不同條件下游泳選手的表現數據。”

“這樣做真的有助嗎？”

“有啊，例如我可以幫他們計算游泳選手穿什麼材質的泳衣在水中的阻力最小，可以



計算出不同的選手每分每秒的差距是多少，還包括不同的選手穿不同材質的泳衣會有什麼樣的差別。我推算出極為精準的數字，這些可能成為決定選手獲勝的關鍵。”他告訴我，因為他熱愛數學，也喜歡游泳，所以才會想出這個提案。

這個提案打動了蘇格蘭的學校，學校不但通過了他的博士申請，還願意提供全額獎學金。

“即使是申請學校，也要多用點腦子，如果只是寫貴校有多好，自己很想成為其中的一員，很難在那么多申請人中脫穎而出。我覺得應該反過來想一想：學校為什麼要收你？你能為學校貢獻什麼？我攻讀的數學運算是十分精細的學科，就算今年無法幫他們的選手奪得優勝，下一屆奧運會也有機會，所以這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很多時候，我們都以為成功的人是因為特別幸運，或是因為佔有較多的資源，所以可以取得傲人的成績。實際上，要想在眾多精英中脫穎而出，必須比別人多想一步，而多想的這一步往往是一個人最後能夠勝出、成就目標的關鍵。

喜地擁抱高科技帶來的無限可能之後，嘗到的那些出人意料的苦果，而且這些預言還都實現了。比如第三集里人們在腦子里裝上芯片，可以儲存下生活中的所有細節，在發生“你說過”“我沒說”的爭執時隨時調出來對質，結果把夫妻、朋友間的關係搞得一塌糊塗。今天微信朋友圈的對話記錄已經差不多具備了這種芯片的功能，也產生了同樣的後果。這些2011年播出時還算是奇思妙想的情節，只用了不到五年就成了現實，怎能不讓人不寒而慄？

《紐約客》雜誌2015年11月登了一篇萬字長文，以《末日發明》為題探討人工智能可能給人類帶來的後果。文中提到意大利物理學家費米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星際空間中有眾多可能產生生命的星球，其中很多比地球年齡還大，我們卻仍然沒有發現人類之外的任何文明？文章的主角、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院院長、哲學家Nick Bostrom給出了這樣的猜測：或許其他的文明並不是沒有出現過，而是已經在成熟之後終結，而將那些文明引向成熟並導致其終結的正是科技的發展。這就是說人類如今正在向同一個結果大踏步地前進。

為了恪守和磚頭機之間的約定，我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越來越凌亂：在飯桌上當所有人都拿起手機拍照時，我尷尬地拿着筷子靜候；一遍遍向所有人解釋為什麼不能往我的手機上發照片；跟那些發了電郵沒及時收到回音的人道歉，讓他們明白，當我沒在家或辦公室時真的不能查看電郵；然後用一句最招人恨的話得罪光所有說中文的朋友——請別給我發短信，我看不懂中文。

猶太裔作家埃利亞斯·卡內蒂在其代表作《群眾與權力》里說：“人們喜歡一起逃跑，因為這是最後的逃跑方式。他們感受到同樣的興奮，一些人的活力和另外一些人的活力會互相促進，人們推動着彼此朝同一個方向跑，所以當人們一起跑時，他們就會覺得危險被分散了。”

這大概也是當人類一起沿着AI鋪好的道路向前飛奔時，竟然會毫不恐懼而是滿心歡喜的原因吧；在這場狂歡中，或許自以為清醒並朝相反方向跑去的人才會因為眾叛親離最先死于荒野吧。

這個念頭把我嚇出一身冷汗，可是我畢竟還想當個一諾千金的正人君子。於是最後，我瞞着磚頭機，悄悄去買了個iPad。



就算你不關心科幻，歷史也沒法讓人寬心。很多年前美國人有個理想：製造工廠里只有一人一狗和一堆幹活多快好省的機器，人的任務是喂狗，狗的任務是擋着人讓他不去干

擾機器，而機器的任務是完成剩下的所有工作。到如今聰明能幹的機器基本已經讓人們實現了這個理想，但那些不用再幹活的製造業工人並沒有過上幻想中的幸福生活。

在跟機器的博弈中，人類贏得的從來都是細枝末節的利益，輸掉的卻可能是整個世界。